

缘分

一位美国麻醉界华人领袖的经历



K.C. Wong [美] 著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缘分

一位美国麻醉界华人领袖的经历

K. C. Wong [美] 著

周 游 于 琰 译

黄宇光 罗爱伦 审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分/(美)K. C. Wong 著;—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05. 5

ISBN 7-81072-683-8

I. 缘… II. ①K… III. 自传 IV. K837.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6727 号



一位美国麻醉界华人领袖的经历

作 者: K. C. Wong(美)著

译 者: 周 游 于 璇译

责任编辑: 李春宇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兰星球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6.375

字 数: 140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一版 2005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28.00 元

ISBN 7-81072-683-8/R·676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前言

这本书讲述的是我平凡的一生。我已竭尽全力回忆我在中国度过的孩提时代和在夏威夷檀香山的青春岁月。为我的麻醉学术生涯，以及在犹他大学担任教授兼麻醉科主任之要职打下扎实基础的其实是在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接受的医学教育及科研训练。许多意料之外的际遇，丰富了我此生的旅程。

本书的撰写并未遵循任何独到的风格。我童年的经历，可以作为孩子们的睡前故事；我的学习历程，就像和朋友在聊天。我在麻醉学术及临床工作上遇到的挑战，可以成为雄心勃勃的年轻医师的动力之源。

我的人生哲学，全都基于在中美文化双重影响下的个人经历。我只希望这些故事至少能娱乐读者。如果本书中的任何一段有幸让某位读者在他的个人事业发展上获得一些启迪，那么这种意料之外的效果将让我备感欣慰。



2005 年 1 月 1 日于台北

审译者前言

K.C. Wong (黄光中) 教授是个谦逊和蔼的人，他在麻醉学的医、教、研等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开展的工作遍及美国、亚洲及欧洲。几年前当我们建议他写一本自传时，他觉得这个提议有些滑稽，因为他认为他的人生并不是值得尊崇的典范，他的故事也不会特别引人入胜。不过，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最终改变了想法，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人生历程。

黄教授出生于中国重庆，抗日战争期间在四川住了近八年，然后回到了他父亲的故乡——檀香山。在本书中，黄教授讲述了他在中国和檀香山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及社会经济环境中的经历。杰出的学术生涯，是他始料未及的。在校期间时有波动的成绩，致使他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以进入医学院，把握转瞬即逝的机会、朝着自己的目标稳步迈进！

黄教授是中西方科学思想交融产生的学者。曾经担任国际麻醉研究协会 (IARS) 主席。他是美国任期最长的终身教授兼麻醉科主任，直到2002年才从犹他大学退休。他那耐人寻味的故事，对世界各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年轻人都具有激励作用。他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志者，事竟成！他相信：一个人的才能资历，能够消弭种族间的差别待遇。在一切事上他总秉持着“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应怎样待别人”的原则。他深信：周围人对你的看法，常常比客观事实来得更重要！不过，他并没有把此生的辉煌成就都归功于自己，而是坚信，生命中的一切都发自“缘分”。

黄宇光 罗爱伦

2005年3月27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缘分，是命中注定还是巧合	(1)
第二章	在上海的最后时光	(6)
第三章	在川渝的孩提时代	(15)
第四章	檀香山，成长的伊甸园	(22)
第五章	转折点	(31)
第六章	艰难抉择：内科还是麻醉	(38)
第七章	看法决定一切	(50)
第八章	西雅图，学术的天堂与人生的课堂	(56)
第九章	盐湖城，沙漠中的绿洲	(68)
第十章	在阿拉斯加的休假与继续教育	(79)
第十一章	比利时的贝尔瑟与杨森制药公司	(97)
第十二章	我如何建设麻醉科	(109)
第十三章	重续亚洲前缘	(123)
第十四章	麻醉学如同中国一样雄狮初醒	(143)
第十五章	我的两个家庭	(170)
第十六章	宗教与家庭价值观	(185)
第十七章	回顾我这一生	(193)



第一章 缘分，是命中注定还是巧合

“缘分”是中国人一种古老的信念，意思是说每个人的福分都是上天预先安排好的。人们最常用“缘分”一词来形容一对有情人的邂逅和相爱。他们通过结婚生子来证明彼此的爱与奉献精神，并使得这个家族繁衍不息。很可惜的是，英文中没有任何一个单词能确切地涵盖“缘分”的意义。我所能找到最接近的大概就是 destiny（命运，命中注定），韦氏字典将其定义为“一个被某种不可抵挡的力量预先决定的事件进程”。不过，这个定义缺少了“缘分”所蕴含的对美好结局的信念。“命运”可好可坏，可是“缘分”却总是美好的。

在遇到我的第二任太太佩珍之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缘分。缘分可以简称为“缘”，我和太太一定是因为有缘才走到一起的。如今中国人在很多场合都喜欢用到“缘”字，有时甚至连不该用的时候都给用上了！比如说，经过苦苦寻找终于买到了一间喜欢的房子，因为这间房子跟你有缘；遇到一个给你带来好消息或好运气的陌生人，那也是缘；买车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业务员费尽口舌要卖给你车子，但是最终你在某一位业务员那儿把车子买下来，这也可以说是缘；更有甚者，你在数日的旅行结束之前给了你的导游一笔慷慨的小费，她会笑着向你道谢，并对你



说：“我们真有缘！”除了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缘”以外，我倒是深深相信，我和我家人的种种经历都和“缘”息息相关！

我不是一个华而不实的人，也一点儿都不复杂难懂。我就是那种被美国俚语形容为“所见即所得”的人。在过去几年间，好几个中国朋友以及同事都建议我写一本自传。开始我总是婉言谢绝，因为我实在认为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然而，经过再三斟酌后我决定采纳这个建议，因为不论大家是否有兴趣来阅读我的故事，至少我可以借此机会回顾我的一生，这将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此外，本书也可以给我的孩子当作睡前故事来享受。

1936年11月12日，我出生在中国重庆，那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父亲出生于1910年5月15日，从小在夏威夷的瓦胡岛长大。夏威夷群岛是在1950年正式成为美国的一个州的。父亲从夏威夷大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北京，并在那儿娶了我的母亲。由于战争和其他种种考虑，他们一直在中国呆到1945年二战结束。在我们等待回美国的这段时间，母亲在上海逝世了，随后父亲就带着我和妹妹，身无分文地回到了檀香山。再后来，父亲娶了我的继母梁梅（Liang May），还给我添了三个弟弟。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成长中的我在檀香山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

13岁开始，我就在每天下课后送报纸赚点零用钱。我几乎干过一个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的檀香山的孩子所能干的所有的活。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时没有任何关于雇用童工的法规。我帮人割过草，在餐厅收拾餐桌和洗碗盘，卖圣诞卡，推销运动器材以及在海滩上当救生员等等。这些打工赚来的钱，让我得以购买了



仅有的几张正式全家福之一：
我与妻子佩珍、儿子卓麟



生平第一辆自行车，还让我在高中时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在瓦胡岛成长的日子总是充满着惊喜。童年时期的打工经历教会了我责任感和理财的技巧。虽然我在学校并不是个优等生，但是毕业时“B+”的平均成绩已经足以让我进夏威夷大学继续念书了。然而一进大学问题就来了！我发现，高中时期在海滩上当救生员学的那一套到大学里完全不管用。在夏威夷大学不上不下地混了两年之后，我恍然大悟：如果我还想进医学院的话，我必须改变学习环境并设法取得更好的成绩。于是，我转学到爱荷华州立大学（爱荷华科学及机械人文学院的前身）就读。去爱荷华州上大学后，我的人生有了新的方向，成绩也有了奇迹般的飞越。在爱荷华，我邂逅了我的第一任太太翠莉·巴芬顿，她后来给我生了三个可爱的女儿：小玉（Jade，意为翡翠）、雪儿（Shale，意为贝壳）和安碧（Amber，意为琥珀）。在医学院和研究生院的那几年，我们俩携手奋斗，把每一刻都过得有滋有味，日子总是充满着希望和目标。

我的最佳学习榜样，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的麻醉科主任约翰·琼斯教授，他也是我麻醉学生涯的引路人。经过内布拉斯加大学两年的研究生临床训练之后，我遇上了华盛顿大学的麻醉科主任约翰·伯尼卡教授，他不仅给了我一个令人“难以抗拒”的工作机会，而且为我奠定了未来学术生涯的基石，使得我在犹他大学任教授兼麻醉科主任达23年之久。

唯一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8岁时就离开中国，从此再没受过任何中文教育，也没有和母亲家里的亲人保持联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缺陷。

1969年，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台湾高雄的麻醉学教授，曾清楷



医师，后来我们成了多年的同事及好友。1983年，他邀请我去台湾参加了台湾麻醉医师学会年会，并藉此引领我重新体验了祖先们的遗产——久违的中华文化。这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我往后20年的生活。我和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的麻醉学同仁建立了特别的关系，其中最特别的是我因而邂逅了我的第二任妻子吴佩珍女士——一位地地道道的台湾女子。在她的帮助下，我重拾了一部分仅在童年时期学过的中文。在我58岁那年，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卓麟（Kaston），这样，我的姓氏就会随子子孙孙流传下去。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很受重视的。

我的一生有无数个转折点，它们仅仅是巧合，还是源于命中注定的缘分?! 接下来我要讲述的，就是在我的平凡一生中发生的故事。



第二章 在上海的最后时光

“妈妈不能跟我们去夏威夷了，她已经去了天堂。妈妈其实也不想这么早离开我们，但是她现在生活在一个既美丽又安宁的地方，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忧愁，还有很多亲人朋友陪她一起玩儿。”这是当时正值壮年的父亲，尽全力保持镇静和恰当的语气，慢慢选择合适的字眼，向他8岁的儿子及6岁的女儿解释他们的母亲刚因为妊娠的并发症而去世。他接着说道：“你妈妈老是在说，我能有这对儿女真是太幸运了。我的儿子将来会成为一位医生，要是我病了他就会照顾我；而我的女儿会给我做好吃的。“我的父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我的妹妹艾琳，我们就这么在床上哭着，呜咽声偶尔会被房顶的瓢泼大雨所淹没，或者被吞噬在噼啪的雷电摇动卧室木墙和地板的吱呀声之中。那一整夜，我和艾琳一定问了许多关于妈妈的问题，例如：她为什么会去世？为什么药物不能治好她的病？为什么妈妈偏偏选择在我们即将离开上海去檀香山的时候离我们而去？我已经不记得在那令人伤痛的夜晚我们是几点睡着的，但一觉醒来的时候，我们家的老厨子已经把中式早餐摆上餐桌了。当我长到能和家人一起吃餐桌上食物的时候，那位厨子就一直和我们在一起。在旧中国，忠心的仆人或厨子和主人一同生活，并被当作家庭的一员来看待。有时



我的母亲张莉莉



候，夫妻两人共同服侍主人一家，这占去了他们一生中相当长的时间。

20 世纪前叶，上海是中国国际事务、文化与经济的中心。我们只在上海呆了一年，等着美国大使馆受理我们的护照，好让我们能回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当时正是 1945 年 9 月，也就是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先后投下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原子弹，逼得日本投降之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使得上海满目疮痍，我们在上海的那段时间，战火蹂躏过的城市才刚刚开始重建。在我的记忆里，上海并不如历史所描述的那样，也不像今天这样是个繁荣的国际化都市。上海给我留下的最不愉快的回忆，除了丧母之痛以外，就是在小学二年级因为和几个小朋友在走廊上追逐嬉戏而遭到老师的鞭打，那条竹鞭在我腿上留下的几处青淤，过了好几天才散去。这样的文化，父母和孩子们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接受的。中国文化要求学生崇敬老师，因为教育被看作是一个人走向成功最基本的踏脚石。做学生的一辈子都得对他的老师怀有特别的敬意，这是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的传统。

我和父亲、妹妹一起搭上名叫“威尔森总统号”的美国大货船，于 1945 年 12 月回到了檀香山。那是一趟非同寻常的旅程。为乘客准备的几百张简易军用折叠床在甲板上一字排开，大多数的旅客都是在二战时受困于中国、准备返回家乡的美国人。只有少数几个珍贵的船舱是供应给有钱的旅客的。普通乘客吃东西就像在食堂里那样，用一种有分隔的军用铝制托盘领取食物；有钱人则可以到餐厅用餐，吃的东西当然也会不一样。我跟一个住在船舱里的小男孩交上了朋友，我答应陪他打乒乓球，条件是他帮我带些剩下的炸鸡。有自己喜爱的食物作为致命诱惑，学习“孩



子式的交易”就成了一件很有趣的事。一个孩子可以找父母哭哭闹闹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其他的大多数时候他必须和伙伴们做点交易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们的折叠床会前后左右摇动，如同在狂风中摆动着的吊床。有一天晚上我偷偷溜下床，只为了看看别人是否也有同样的困扰。我发现到处都可以听到呻吟和哀号，更可怕的是，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呕吐物的味道。那天海上的天气真是糟透了。因为有太多人晕船，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飞快地巡视了每一张床的旅客，给予言语上的安抚，并给那些确实病了的人一点药物。毫无疑问，那是我们横渡太平洋之旅中最艰难的一个晚上。事实上，那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一次花四个星期乘船来横渡太平洋。

夏威夷瓦胡岛是我父亲的出生地，他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的前22个年头。我的祖父母是1896年从中国广州移民到那里的。他们是一对勤勤恳恳且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夫妻，虽然没有什么特殊技能，但是有创造崭新生活的决心。我的爷爷当时从事农耕，种植一些菠萝和甘蔗——它们直到近代还是夏威夷特产。现在，夏威夷的主要产业不再是菠萝和甘蔗了，而是观光旅游。父亲在8个孩子中排行老四，有4个兄弟和3个妹妹。爷爷在父亲11岁那年就去世了，按照中国的习俗，长子必须在父亲死后担负起照料整个家庭的重任。于是，我的大伯找了好几份工作，白天当邮差，晚上还得到一家餐厅打杂。其他的伯伯也在年龄长到能干点活时，帮忙分担养家糊口的责任。因为我父亲是老四，所以他在家庭经济或弟弟妹妹的抚养上没能做出最主要的贡献。值得一提的是，多亏了父亲的三位兄长，才使得除大伯之外的所有叔伯阿姨都读到大学毕业。后来，父亲在1932年从夏威夷大学毕业



后不久就回到了中国，置身那古老的世界并寻找他的根。13年后当他再度回到瓦胡时，兄弟姐妹们都希望他能赡养病弱的母亲。这对于一个有着两个年幼孩子的鳏夫来说显得格外困难，更何况当时父亲不名一文！

不过，我的父亲是个意志坚强的男人。他人生的座右铭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确实是在任何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三个基本要素之一——第二是在机会来临时有资质去把握住它，第三则是运气。漫漫人生路上，我看过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带他们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不外乎这三点：毅力、资历和运气。值得庆幸的是，仿佛时来运转似的，父亲有一个相当成功的同学——陈洪戊（Hung Woo Ching）先生，他在二战时搞房地产发了财，并且成了涉足多个行业的企业家。他让我父亲当努阿诺纪念公园的管理员，那是一个有着质朴情趣的墓园。这无疑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要不是这样的话，父亲要在夏威夷重新立足、找个工作并养活一家老小，恐怕会是一番相当艰难的挣扎。我想，在上帝眼里，我的父亲一定是个仁慈宽厚的人，因为上帝又赐给了他一个好女人，陪他走过了五十多年的生命历程，还给他添了三个儿子。我的继母梁梅就像救世主一样及时地来到了我们家。要是没有她，父亲实在不可能从新的工作中分身照顾两个还在念小学的孩子。父亲初到北京时，梁梅既是他的朋友，又是他的吉他班上的学生。她不仅受过英文教育，而且抗日战争期间在美国大使馆工作了多年。她肯定经历了战争中最为残酷的日子，并设法从炮火中安然无恙地逃了出来。当时，如果她不是坚强成熟的年轻女子，要适应一个全新的环境，同时还要担任两个年龄大到足以让人操心而且不会很合作的孩子的继母，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更何



况还有一个年老病弱的婆婆等她来照顾。回想起来，她真是个上天派来的天使，可惜的是，直到多年以后我长大成人了才懂得珍惜。

我对生母的记忆，其实已很模糊。在中国生活的那8年里，我和父母共度的许多美好时光也已从脑海褪去。所以接下来我会多讲一些关于母亲一方的长辈的故事。我可以理解我的父亲为什么没能在我们小的时候给我所需要的关注，因为我们回到檀香山后，我的父亲为了生计、为了能让全家人过上新生活，心力交瘁地工作着。从十几岁起我就已经非常独立了，像我这样的孩子是被家人忽略和经济窘迫的产物。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年轻人，我并没有获得成长中的年轻人所应该拥有的精神支持。不仅如此，我还发现如果我想要一样东西，自己想办法赚钱买比向父母开口要省事些。我必须向自己证明，我为什么需要那样东西？接下来我还得在想要的东西和为了得到它必须付出的努力之间权衡轻重。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学习独立精神的价值，毕竟独立自主是一个成年人必备的特质。然而要是孩子在太小的年龄学得过分独立的话，他的情感可能无法正常发展，还可能产生拜金主义的负面影响。下面请允许我解释一下：孩子需要与父母沟通才能学到这个家庭的价值标准，他需要时间来成长，而他醒着的时间通常有一半是在学校度过，另外一半才是与家人共处的时间。家庭的价值观念便成为一个人完整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孩子的成长和成熟来说，仅仅提供经济上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我相信大家一定听说过出身富贵人家的孩子长大后却一事无成的例子。因此，在一个孩子连续不断的成熟塑形期内，他必须和家人一起度过充实的时间，学习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如果一个孩子相